

第三章 現代性

在完成方法論及態度的探究與建構之後，紀登斯將其論述重點轉移到其一直持續保持注意的另一部份——現代性中。筆者認為結構化理論是紀登斯對社會科學本質所進行的較抽象思考所獲得的成果，現代性的相關論述則是他對歷史發展至今，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呈現出來具體現象所做的進一步分析。紀登斯對現代性的分析重點主要集中在先進現代性、晚期現代性或高度現代性，但不同於一些學者從認識論的向度，針對知識到底是異質性多元或者能夠得到一個可普遍化的知識所進行的後現代性或現代性的論爭，紀登斯則是以帶有文化與認識論意味的制度性面向或者說是本體論的向度進行探討，亦即關心人的存在、行動、社會再生產及社會轉型方面的問題。

紀登斯採取這種取向的原因，在於他（1990: 2-3）發現一方面現代主義企圖為知識奠基以及對人為設計充滿信心的論述，相當程度地被證明已經失敗，後現代主義因而主張我們已經進入知識異質宣稱的時代；另一方面，由哈伯瑪斯為代表，對後現代這種主張的標準反動，乃是企圖證明一致與普遍化的知識是可能的。紀登斯則企圖解決二者之間的爭端，他認為人們之所以會產生迷惘，認為不可能獲得關於社會的系統性知識，乃是因為我們面對了太多無法了解及控制的事物，進入了比過去後果更基進、更普遍的時代。因此，他主張在分析上不應只採取文化或知識論導向，更應該進行制度分析。但紀登斯的學說仍有其影響脈絡，因此本章第一節將先討論他對涂爾幹、韋伯、馬克斯等人在現代性方面思想的重新詮釋，第二節以後再針對其現代性學說內容進行討論。

第一節 對社會學先驅的詮釋

紀登斯(1971)在《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一書中，將馬克斯、涂爾幹及韋伯並列為古典社會理論的三大家，並對其思想做了非常不同於當時主流的重新詮釋。紀登斯特別指出帕森斯等人將韋伯及涂爾幹理論中的推動力做了錯誤的理解。對於韋伯，帕森斯等人將韋伯的理論置於抽象的社會秩序主題下進行理解，實際上韋伯是嘗試在日耳曼的特殊政經社會發展脈絡中掌握資本主義與現代國家的分別。同樣的，涂爾幹的主要議題也不是秩序問題，而是要區分傳統與現代社會，並且在關心現代社會的道德形式時，回應康德式的觀念主義及霍布斯式的功利主義，提出一種新的、更具有自由度的道德個體主義，而且他也認為在現代社會中道德及自由並不衝突。紀登斯指出此二者的學說都不是直接針對馬克斯的反動理論，雖然二者的學說中有些部分是針對馬克斯信徒所做的回應，但他們更主要的是回應日耳曼及法國的保守主義，主張結合理性及民主的新式自由主義，這方面反而與馬克斯的議題是接近的。

紀登斯進一步指出韋伯並不是透過重新主張觀念主義來反對馬克斯的物質主義，而是要嘗試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韋伯與馬克斯同樣認為物質力量及階級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特色。而涂爾幹與馬克斯在人的本性及社會的抽象要求上所做的思考也都沒有太大差異，兩人都看到了人類的需求及社會所產生的限制，都受到社會變遷的激發，也都試圖了解現代社會的特殊動力。甚至涂爾幹也並不如其他學者所認為的只注重如何維持社會秩序，實際上他更關心如何獲致變遷，涂爾幹與馬克斯的差異來源主要是對變遷的不同分析，尤其是階級衝突的起源及意義。

綜合而言，紀登斯認為以上三位學者都是嘗試為十九、二十世紀間各自所在國家社會所發生的重大不連續現象，由資本主義、新型國家、文化問題所呈現的議題提出對應之道，並且各國的特殊變化都提供了反思現代社會本質及動力的特

殊脈絡，因此三者都不是要發展抽象的社會理論，對他們的正確分析應該將其重新放到他們所在的具體時空脈絡中。

然而紀登斯仍認為三位古典社會理論者的主張都有其缺點。韋伯的理性化理論未能充分掌握現代世界有意義變化的可能性，因為他沒有充分了解現代社會的道德基礎。而且韋伯的觀點主要連結於貴族式的英雄、男子氣概價值觀，無法看到現代社會中產階級除了平庸表現之外的凝聚形式。涂爾幹雖然發展出主動民主參與的職業團體，及共和式政府的觀念，因而得到其道德秩序理論，但他連結集體意識及道德個人主義的作法，使得他忽略了如何有系統性地處理政治權力產生的問題，及因為利益而產生的衝突問題。至於馬克斯將生產力的進步視為社會的進步，對自然進行工具式的了解，這種勞動觀念不足以掌握人們關係的複雜性，也未曾注意到環境可能會因為工業擴張而退化的問題。

紀登斯認為必須與這些古典社會理論斷絕。因為這些理論都是基於資本主義或工業主義的化約理論，並且有演化論取向；三者都忽略了其他制度的自主性改變，如行政權力的增強、戰爭及軍事力量的成長、民族國家的興起及其在世界體系中的區域化，及現代的特殊文化面向；三者也都未注意到歷史是一種機緣式的發展，經常是斷裂式而非連續式的線性發展。此外，三者也都太過於傾向決定論，忽略了人的能動性。基於上述的批評，紀登斯乃嘗試在日後發展出了更具有反思性特色的社會理論，並以更複雜而多樣的方式呈現當代社會的動力學。

第二節 現代性的發展

紀登斯(1998: 94)對現代性最完整的定義是將現代性解釋為含有三大成分，第一是人們態度的層面，相信世界乃經由人類不斷的介入而改變；第二是一組複

雜的經濟制度，特別是工業生產與市場經濟；第三則是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國家與大眾民主等。它在性質上非常不同於過去的社會，具有極大的動態性，而且其各種制度都是未來導向的。以下就現代性作為一種制度的形成過程、制度、動力及影響後果進行分析。

一、現代與前現代的斷裂

基本上紀登斯（1990: 4-5）同意現代性的起源大致上是來自於十七世紀歐洲工業、政治革命，以及思想史上的啓蒙時期之後，人類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從傳統與自然的束縛中走出來的看法。但他更重視現代性發展到晚近，所呈現出來的「反身現代性」或「高度現代性」特性，並從這些結果回過頭來重新看待現代性的發展。整體來說，紀登斯認為現代性是指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化後的社會，是一個更動態、更未來導向，更有全球性影響的社會，與傳統有著極大的不同。但紀登斯認為除了區分現代與傳統之外，晚近（先進）的現代性概念也極不同於啓蒙現代性的概念，因此，以十九世紀傳統延續而來的社會學理論來解釋當今社會是不恰當的。先進現代制度在根本動力、顛覆傳統的程度以及全球性的衝擊上，都不同於以往的形式，可以說現代生活在廣度、深度及速度方面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掃除了傳統的社會秩序。在廣度方面，現代性已經使得全球社會彼此連結起來，在深度方面，現代性影響深入個人日常生活最私密的層面，其變化之大已經無法由過去的知識來加以解釋。

由於早期啓蒙現代性與晚近現代性的觀念極為不同，因此，紀登斯（1990: 5-6）對現代性的解釋所採取的不是舊式直線發展的簡單現代性，而是兼顧其限制與矛盾、不連續性、非進化論、非簡單線性的「反身現代性」觀點，有無限種可能的發展方向與形式，沒有單一的整體形式與方向，也沒有普遍且單一組織或轉型的動力原則，不適用許多社會學家所採用的分化（differentiation or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或進化的概念。但不連續性也並不代表歷史就是混亂的，或可以

寫出無限多種各具特性的歷史，因為歷史的書寫無法完全擺脫實際發生的事物。

不連續性除了是變化的速度、深度與廣度超乎過往之外，也在於出現了許多非傳統的事物，如民族國家、非動物性的生產力，以及產品及勞動力的商品化，這些事物與傳統幾乎沒有關聯。另外一些事物雖然與前現代社會有若干相連，但卻在根本原則上有所差異，如現代城市與傳統城市，乍看之下雷同，但在根本的組成上並不相同。這些現象的出現，除了外生性（*exogenous*）與內生性（*endogenous*）間的辯證之外，還可能導因於機緣性（*contingent*）或事件性特徵。

在具體的分析內容上，紀登斯（1990: 16,53, 55-63; 1991: 32）一方面將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監控現象及軍事權力當作是現代性發生的四項主要制度性向度，另一方面則指出時空分離、抽離機制的發展，以及對知識的反身/反思性融攝（*appropriation*）是現代性「極端動態性」的三大來源或要素。至於制度性向度與極端動態性的三大來源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三大要素既是蘊含在這四項現代性制度中的特色，也是這些制度的促進條件，使得現代社會的轉變得得以發生，它們涉入現代性的制度中，也受到這些制度的約制，因此現代性的制度面向與動態性要素相互增長、相互影響，並由此產生全球化、去傳統化、信任——風險、自我認同及親密關係的改變等後果。但在後果方面，筆者認為可以區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為偏向於大範圍結構性的部分，如全球化、風險與不確定性，以及去傳統化⁴；另一部份則是能動者面對結構所產生的對應之道，如自我認同及親密關係的轉變等，前一部份將在本章進行討論，後一部份則可以與紀登斯對政治的主張合併討論，故列入下一章進行論述。

二、制度性向度的發展

紀登斯（1990: 7）認為現代性的出現不能以任何單一的驅力解釋之，涂爾幹

⁴在 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 vi-vii) 合著的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中，提出反身/反思性、去傳統化、生態議題及知識的弔詭性，作為三人共同的思想匯聚處；在紀登斯《超越左派與右派》一書的導論中則以全球化、傳統及不確定性作為影響當代社會的三項基本變化（1994b: 4）。

所主張的工業主義、馬克斯所認定的資本主義，或韋伯所認定的理性化等因素都不能被視為是互相排斥的特性，現代性必須被視為在制度上具有多元向度。

從 1973 年的《階級的結構》，紀登斯就開始批判並採用了兩種對立的看法，分別是持正面看法的「工業社會理論」及持負面看法的「資本主義理論」。其後並另外增加了兩項向度：監控現象與軍事力量，成為他對現代社會進行探討的四個向度。

紀登斯指出（1981:5; 1990:11-12,55-59）資本主義是一種勞動力競爭及生產商品化的系統，有強烈的競爭與擴張性，政治力對其影響相當程度地被排除在外，但資本的累積卻可能影響到國家的自主，因為國家的收益依賴於資本主義過程的穩定及資本的累積，而資本主義之所以會產生破壞性的後果主要是其以增長為目的之倫理觀、普遍商品化及經濟的兩極化；工業主義指以非生命力的物質力量來生產物品，主要是以機械生產為基礎的科學及技術文明發展，其影響的層面不只侷限在工作場所，還影響到交通、通訊及家庭生活。上述二者共同構成現代性的技術基礎。監控與軍事力量則與民族國家有關，監控是現代國家藉由將訊息系統建構成新型態的管理權力而形成，透過相關資訊的蒐集或直接的監控，現代國家行政系統對領土內人民在政治方面活動的協調控制能力超過任何一個古代的大帝國，但卻也帶來了極權統治的威脅。至於軍事力量除了在一國之內的軍事力量都集中於中央的完全領導，不同於以往依靠與地方諸侯結盟的方式之外，大規模的戰事不同於以往，也被用來區分現代與過去。上述的這些面向彼此之間關係複雜，並不完全互相獨立或互相依賴，但基本上，國家所能掌握的主要是監控與軍事力量，資本主義與工業主義則非國家所能完全掌握。

三、現代性的動力

紀登斯認為現代性最明顯的特徵一方面是組織的強化，另一方面則是極端動態性。其動力主要來自三方面：第一，時空分離、延伸與重組，以及將社會生活

加以精確的分區 (zoning)；第二，社會系統的「抽離」(disembedding) 機制，是由象徵性符號與專家系統所組成的抽象系統所產生；第三，對知識的反身/反思性的應用，亦即經由知識不斷地投入而影響個人及團體的活動，所造成的社會關係反思/反身性重組與再重組。

(一) 時空的組織

紀登斯認為現代性的時空組織不同於以往。他所提出的「時空分離」，應該與「時空延伸」、「時空重組」是一組的概念 (黃瑞祺，1997：292；2001：75)，這些概念都與時間與空間在其中如何被組織，以連結在場與不在場的情況有關。

紀登斯 (1990: 17-21；1981: 8-9) 認為在前現代時期，時間的經驗或報導都必須與社會空間中的其他標誌相連接，或者說時間必須透過地點的情境與活動來做連結，具有不精確及可變的性質，如農夫在農忙時期與農閒時期，時間對其意義即顯然不同，而漁夫的漁忙與閒暇時期又顯然與農夫不同。到了時鐘時間發展出來，並且與社會組織的報時機制相協調後，全世界才有一標準化的計時系統以及一致的時區劃分，時間成爲一純然、空洞化與內容無關的觀念，並具有標準化的記量方式，避免了各式各樣的混亂，也使得時間商品化成爲可能，日常生活的組織方式乃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時間標準化之後，空間也隨之被空洞化、標準化，世界性地圖的出現標示了現代性空間的出現。在前現代中空間與地點概念基本上是相一致的，都指涉社會活動發生的物理環境與地理位置；現代性出現後，空間與地點產生分離，而與時間一樣變成純然、空洞化、標準化的觀念，且不再存在有未知的私人之地。透過人們主動對之適應與利用，時間的純化與空間的純化兩者相互增強。時空標準化的概念普遍之後，使得不在場的人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被建立出來，地點的重要性大減，場所可以被遠處的社會影響力所穿透與形塑，區域行動的脈絡遭到撤空，超越物理現實，精確協調、規律化的控制管理成爲可能。再加上資本主義的

工作觀念，更使得工作地點與家庭分離，工作、訓練與休閒截然劃分，並依照資本的需求不斷地規劃、更新各種空間。

當然時空因素的分離並非單純而線性的發展，而是辯證性的發展，因此也可能導致相反的特性，同時它也提供了依照社會活動關係來進行重組的基礎，人們也因此能夠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生活時間（lived time）。

時空分離及其標準化而成爲純然、空洞化的概念，對現代社會的極端動態性有相當大的重要性。首先，它克服了社會活動必須鑲嵌或「臨現」於特定脈絡中的限制，而能協調不在場人們的活動，這種「抽離」現象打破了地域性習慣與實踐的限制，大大地拓展了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其次，它提供了理性組織的起始機制，以前所未見的方式連結地方與全球；第三，標準化時間系統提供了對過去有系統而一致的使用，形成一種真正世界性歷史的架構，也使得人類有可茲利用的標準化過去與共同未來，而更能夠利用歷史來創造歷史。以上的現象都使得跨社會系統的相互連結，更加不斷全面而持續地影響了面對面共在情境之下的社交整合。

在時空延伸方面，時空延伸是指社會系統透過社交整合及系統整合的機制，在時間及空間上的延伸範圍。紀登斯（1981: 5, 8）認爲傳統社會的時空延伸與社會組織基本上是由兩方面來完成：一是傳統的正當性，另一則是社會關係結構中親屬的角色，兩者通常又定位在宗教中，而這些又都牽涉到「在場」，人們與那些物理上不在場的其他社會的人們則很少有互動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時空延伸受到儲存能力的影響，在早期社會中人們的記憶是主要的儲藏容器，可對時空加以含括或擱置（bracketing）。所謂的含括或擱置我們可以做兩種的解讀，一方面，人們的記憶使得一定時空被包含在其中，有如括號標示出其範圍；另一方面，所謂記憶的「擱置」效果使得不同時空的事物能夠會合在一起，讓事物能夠跨越時空而發揮作用，也有讓時空距離在此不產生作用的意涵。由於記憶及物質儲存能

力的發展，使得社會由採集及捕獵社會、農業社會到工業資本社會，延伸範圍不斷地擴大，而勞動力商品化及時間商品化更使得時空延伸的範圍擴大至全球。此外，儘管現代社會通常以民族國家為範圍具有清晰的界線，但在社會政治與文化方面時空延伸必然會有超越國家範圍的交織與連結，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觀察現代制度如何在時空中被情境化。

（二） 抽離機制

與時空的分離、延伸與重組密切相關的是抽離機制。紀登斯（1998: 98-99）認為現代社會因為抽離機制的出現而持續不斷地被「抽離」與「重嵌」

（re-embedding），使得發生在遙遠地方的事件和行動可能會不斷地影響我們的生活，而我們的生活也會對遙遠的他人行動與事件有所影響，且其相互影響程度日益加深。人們的生活形式與社會關係也被從地區性的脈絡中拔出，並進行穿（跨）越時空的重組、塞回與脈絡的重構等等。不僅人們的溝通方式發生改變，社會的組織方式也發生了改變。

紀登斯（1990: 22-29）區分兩種「抽離」的機制，一種是「象徵性符號」（symbolic tokens），另一種則是專家系統。象徵性符號意指具有普遍被接受的標準價值，可以通行無阻，不受持有者特性所影響，而可以在多元情境中進行交換的媒介。他以金錢為例，說明了象徵性符號是透過將當下與延遲、在場與不在場配對，而把時空擱置，使時空因素不發生影響的方法；專家系統則指技術性技能或專業性的專家知識系統，它們深入生活的各個層面，對我們生存在其中的物質或社會環境進行相當大範圍的安排。專家系統有其獨立的有效性，對我們行為的許多面向具有持續而統整的影響，其影響之大，已經沒有人能擺脫之。紀登斯又將專家系統與象徵性符號合稱為「抽象系統」，它們共同成為抽離機制的原因在於它們都把社會關係從脈絡的當下性（immediacy）中抽出。

象徵性符號與專家系統的正面意義在於它們使得人們可以獲得安全感，也使

人們可以將自己一些相關而不完全的知識加以擱置。當然這些抽離機制要能有效地運作，必須有人們的信任，人們之所以會信任抽象系統除了它們所帶來的安全感之外，還在於它們所展現的效率。但抽象系統相對地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使得人們在脫離了自然的危險之後，卻又跳入了人爲的風險之中。

（三）反身/反思性（**reflexivity**）⁵

反身/反思性有兩種含意，第一種含意是人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爲的理由有一種知覺，並進行反思性監控，此是個人行動的一部份，是比較一般性的用法，較無關乎現代性。第二種含意則是社會的反身/反思性。社會反身/反思性是指人們所具有的關於社會或歷史的概念會持續地涉入社會的建構之中，造成社會生活持續受到針對各該實踐而來的訊息所影響，並發生改變，因而使得社會變得越來越由資訊所建構，而不是由既有的行爲模式所組成。換言之，人們所生產出來關於社會生活的知識，會統整到系統的再生產中，使社會生活脫離傳統的固定性。傳統不再具有理所當然的霸權式權威，人們日益具有這樣的一種自覺，即歷史是由社會生活所構成，而社會生活則是每一個行動者都能參與其間的，因此，人們可以創造歷史，可以利用歷史來改變歷史，這即是所謂的「歷史性」。各式各樣的新型論述因此不斷地被創造出來，使得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Giddens, 1990: 36-39）。

反身/反思性涉及的不只是自然科學知識的不斷更新與典範的不斷轉移，更牽涉到社會人文知識的本質，亦即社會性知識並不只具有工具性，而是會透過雙

⁵‘reflexivity’一詞在大部分的翻譯中都只譯爲反思性或反身性，然而要進行反思、反省，必然是以行動者從環境中得到某種返回其自身的回饋爲前提，而且紀登斯（1991: 214）也明確指出‘reflexivity’不只是反思（reflection）而已，它也不只是將自我（self）與全球性的系統連結起來而已，它還連結了身體，因此，反身性的意涵不可忽略。而就反身性而言，社會作爲一個持續存在的系統，其產物會回過頭來影響其自身的狀態，這是一種反身性的效果，但社會雖然作爲一個整合的系統，但卻是透過其成員具有反思監控的行動來產生效果的。因此‘reflexivity’的主要意義可說是人們越來越受到自己（人類）所作所爲的影響，也越來越對自己的所作所爲有所反省，兼具返回自身的「回饋」與「反省」的意涵。因此筆者認爲應同時翻譯爲反身/反思性。另黃瑞祺（1997:13；2001:81）也曾分別譯爲反省或反身性，可爲佐證。但在本文行文脈絡中，由於有時是強調其中之一，有時也只採取反思性或反身性。

重詮釋，螺旋式地進出社會生活世界，重建知識自身與世界，做為整合於再生產過程中的部分。而且，除了人們自身、自然知識及社會知識之間存在辯證性反思關係之外，還存在有「對反身/反思性進行反思」的諸多可能。而當知識被規律化地使用到其所組織或轉化的社會中，成為其構成的部分時，即產生制度性的反身/反思性。

啓蒙的中心思想——「勇於求知」——的發展產生兩種後果，其一是對科學與科技的投入可以讓人對控制與改變世界有更樂觀的預期；其二是後來人們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知道那麼多，或那麼確定（Giddens and Pierson, 1998: 117）。紀登斯透過其對晚期現代性的思辯所得到的心得，即是現代性不是理性自我的不斷開展，而只是人們越來越清楚世界的境況是由人類自己所造成的。因此，紀登斯既不同於哈伯瑪斯認為現代化即是人類理性的開展，溫明麗（1994）所提出結合時間性、進步性與啓蒙性的現代性概念，也不同於紀登斯所認定的現代性，因為他知道現代性的發展可能導致毀滅性的後果，必須防患未然。紀登斯主張我們必須從過去一些夢想中解放出來，但又不應該放棄一種信念，即我們應該尋求塑造自己的歷史。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努力影響歷史，因為我們的生活深深地受到我們所解放出來的歷史力量所塑造（Giddens and Pierson, 1998: 171）。

四、現代性的後果

由於上述現代性的動力與制度相互作用，使得現代性在制度（或結構）面呈現了全球化、風險與不確定性及去傳統化等三大後果，茲分述如下：

（一）全球化

全球化的意涵各種文獻眾說紛紜，甚至互相矛盾，而紀登斯所稱的全球化對全球化提出了相當不同於以往只專注於經濟全球化的概念，他指出全球化有兩種

意涵，是多種過程的複合結果，範圍上也超越一般人的想像。

1.全球化的意涵

紀登斯（1994b: 57; 1991: 21-22）指出全球化有全球相似化、趨同化的意涵，例如全球「民主」化（沒有哪一個國家敢公然宣稱自己非民主國家），以及現代性制度的擴展等等。但全球趨同化也會引發一些關於不同認同、民族主義與新區域的創造等等問題，因此地區與全球是一直處於辯證關係中，而且國家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元素與仲介。

然而，全球化對紀登斯更重要的意涵是指人們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彼此的影響而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地方事務影響的範圍不再侷限於一個地區，而是會遍及世界各地，沒有人能夠置身其外，「他者」不再能夠被視為不活潑而無關緊要的存在，行動者彼此相互質問也成為可能，甚至可以說已經沒有「他者」，有的只是「我們」。紀登斯（1990: 70-78）也從四個制度向度，亦即世界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體系、世界軍事秩序與工業的發展，來檢視全球化現象。

在資本主義方面，商業公司，尤其是跨國公司，其所奉行的最高原則是追求最大的利潤，已經擁有巨大的經濟權力，足以影響本國基地及其他地方的政治決策。而且不只採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受其影響，非資本主義國家也無法置身於其效應之外。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化也製造了階級、不平等等現象。在民族國家方面，民族國家的成立是一種現代社會的形式，它必須與民族國家「體系」的成立一起出現，亦即每一個民族國家都必須相互承認對方具有特定形式的領域性、監控與壟斷暴力使用權。民族國家一方面相當依賴於生產財富的工業，但另一方面它也從維護主權的能力中獲得權力，但是主權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必須不斷地加以反思監控。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具有兩種相反方向的力量，一種力量要求國際間的一致行動，另一種力量則要求維護國家主權。全球的軍事秩序牽涉到戰爭的工業化、武器技術的傳播、國家間的聯盟，以及具有巨大毀滅性的武器的出現。全球

化的工業發展一方面與勞動的分工與分工範圍的擴張有關，使得民族國家更難去控制自己的經濟，其他方面則是造成生態危害的全球化與通訊上的變革。

紀登斯（1991: 21-22）也指出上述三大動力來源都含有將全球連結起來的趨勢，如時空延伸使得遠方的事件與關係影響了地方的脈絡情境；抽象系統可能產生後果重大的災難，甚至連在發達地區以外的傳統區域也深受現代制度的影響。

2.全球化的主要動力

全球化現象是各種過程的複合，但相當大一部分是因為科技、交通，以及資訊傳播的發達所推動（Giddens, 1990: 77-78）。因為它們使得過去對社會發展構成限制的空間及時間等因素重要性消退，使得人與環境的關係不再一定是由近而遠、也不一定依照線性的時間概念，使人越來越有互相依賴與全球一體的感覺，每個人都必須隨時調整思維，不再能將思考侷限於國家之內。換句話說，我們對事件的思考必須關注「在場」與「不在場」的交會，遠處社會事件、社會關係與地區脈絡性的組合，還需注意時空延伸與地區處於繼續發生的、不斷變動的狀態。如果說傳統是透過時間來控制空間，或透過地點來控制時空，則全球化基本上是「遠距行動」，透過空間的重組，使不在場支配在場成為可能。

在科技、交通與資訊等因素中，紀登斯特別強調經驗傳遞形式、數量與能力大幅改變的重要性，因為它們使得人們越來越能延伸時空、擴大反思性監控的範圍。經驗的傳遞方式從最古老的口語傳播，演變為文字、影音的傳遞，從手抄到印刷到電傳，使得經驗的傳遞量遽增。而電子媒體的全球化後，更造成兩項後果（特徵），分別是拼貼效應，與遠距入侵。前者是指不同時空的事物可能被並置，或交錯拼貼在一起，打破時空的限制；後者則是遠方事物透過媒體的再現，產生具體的影響力，其效果甚至超過行動者身邊真實發生的事件，甚至使得有些人認為媒體並不反映現實，而是製造現實。但紀登斯卻不像布希亞（J. Baudrillard, 1929-2007）那樣的憂心忡忡（季桂保，2002），而是認為人們可以相當妥適地處

理好時空交錯的問題。當然要能妥適處理時空交錯的問題也必須以人們文化識能的增加為前提，唯有文化識能的增加才能使得知識與訊息不再為少數人所壟斷，並使得大多數人都能依自身的需要進行反思性行動。

3.全球化的範圍

紀登斯指出全球化不只影響公共領域，也影響個人私密的領域，不只是大部分人所熟悉的金融、經濟領域，還包含國家、地區文化認同、「西方化」對「去中心化」、文化殖民與反向殖民（reverse colonization）等等政治與社會文化領域。雖然全球化早期是由西方開始向外擴張的，但因為它透過抽象系統的抽離機制切斷地方與傳統的連結來達成，因此本質上是去中心化的，雖然現今仍由西方強權主導，但卻不再是單向的，因此它是一個複雜的變化傾向，結果是混雜甚至相互矛盾的，既有破碎性的影響，也有統整的效果。在這種更多更廣的相互參照與影響、更迅速的變遷、與新的合與分的狀況下，許多人因而擁有更多的希望，卻也讓許多人因此充滿焦慮、割裂與無力感。紀登斯認為我們必須透過重建或創造新的各種制度來駕馭它，使其受到適當的羈束，其中一項就是建構一個全球的公民社會，使全球治理能夠建基於其上。但另一方面，紀登斯也不否認各種事務的性質仍然有個人性、地方性、國家性、國際性或全球性等等的分別，需要在適當的層級給予適當的處理。

（二）風險與不確定性

紀登斯認為現代社會是一種具有兩刃性的風險社會，充滿著人為不確定性，有著更多自我決定的空間、機會與必要。面對這些新情勢，人們乃發展出各種新的態度與對策，其中包含區分例行化的日常生活軌跡或關鍵時刻（fateful moment），以及建立各式各樣的信任關係，並在去技能化的趨勢中努力尋求再技

能化，但因為現代社會已經是反身性的社會，人為不確定性卻仍將持續存在。

1. 風險的性質

紀登斯指出（1990: 28-34; 1998: 100-104, 108）風險的概念來自現代的早期，標誌著與過去決裂，而面向開放的未來。當人們開始意識到不可測的結果不是來自命運之神、上帝或自然的不可測意圖，而更可能是來自我們自己的活動或決定時，機率、風險的概念就已經開始。有了風險意識，人們就會積極地去面對風險，並嘗試加以控制。當社會中的人們愈來愈習慣於探求未來生活，並希望能形塑它時，風險的觀念就與保險觀念一起越來越普遍地存在於現代社會中了。而隨著前述社會極端動態性所造成的不確定性日益明顯，風險意識成為認識現代性不可或缺的要素。人們必須進行以下的各種作為與認識：減少對生命具有威脅性的風險；建構具有制度性規範的冒險環境；認識抽象系統在追求日常生活大規模安全過程中所造成的後果；瞭解監控風險乃是現代性反思性的特徵；認識源自全球化的高度嚴重性後果風險；以及認識一個永遠不穩定的風險氛圍背景。

首先，就基本的生命安全保障而言，現代社會中舊風險的降低遠大於新風險的出現，這可從死亡率及壽命方面來顯示，這乃是抽象系統中專家系統發揮作用所產生的效果。但在抽象系統的運作上，專家系統與常人的行為之間有一種相互作用的關係，專業人員及受較高教育的群體，一般而言會起帶頭作用，但專家的意見可能會改變，也可能不一致，因此不確定性仍然存在，而且個體或團體對風險的解釋既有賴於是否引進生活風格的改變，也有賴於這些解釋是否是建基於有效的前提之上。其次，需要加以制度化的結構性風險，例如各種金融活動，實際上影響著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透過制度化才能讓大家可據以行動。第三，對風險的反思性監控內在於所有的制度化風險系統中，雖然它對其他的風險參數而言，可能只是外在性的，但對生活機會及生活計畫卻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專家思考及公共論述組成了風險的概觀。第四，高度嚴重性風險是指那些不常發

生、遠離個體，卻又對個體的生活機會具有直接影響的風險，如核能污染、各種食品、藥物的檢驗報告等等，專家系統中介的知識會在其中有規律地轉化常人的行動。第五，儘管專家知識對常人有極大的作用，但是現代知識的變化與發展特徵卻使得專家知識對常人所產生的效應變得模糊而複雜，現代性的風險氛圍因此乃是無法安定且無法逃脫的（Gidens, 1990: 120-125; 1991: 111-114）。

上述紀登斯風險的相關概念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是風險的客觀分佈，其二是關於風險的經驗或對風險觀念的理解。前者包含高強度而全球化的風險（例如核子戰爭）、數量上不斷增加而又影響每一個人的偶發事件、人造環境或自然社會化之後所產生的風險、影響許多人生活機會的制度風險（如股票市場），以及個人刻意追求的風險等。後者則包含將風險意識為風險、公眾所具有的風險意識、對專家知識侷限性的意識等。

2. 人們面對風險的態度

紀登斯（1990: 134-137）分析指出面對這樣在強度、範圍與類形上不斷變化的風險，人們所採取的態度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四大類，分別是（一）實用主義式的接受：亦即維持著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計畫及期盼短期的收益，而擱置那些無法控制的部分；（二）完全的樂觀主義：認為人類的理性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一切都將好轉；（三）犬儒式的悲觀主義：以幽默及厭倦塵世的態度壓抑焦慮在情緒上的影響，以及（四）基進的涉入：針對已被察覺到的危險積極對其來源進行實踐性的鬥爭，以減少其衝擊或超越它們。紀登斯傾向於對後者最為讚賞。此外，在這些適應性的反應背後，人們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仍須維持，這除了透過將生活建構成爲常態與可預期的例行性活動之外，也要透過對抽象系統的信任來進行。

3. 面對風險的策略之一：區分例行性與關鍵時刻

例行性如本文前所分析，是指個體藉由在日常生活的例行活動與生活世界的常態化外表中建立的本體安全感來作爲其保護罩，將那些會引起恐慌的事件與觀

點排除在外，這些習慣性的情境需要個體付出的努力才能獲得。

但是生活中仍存在有會穿透本體安全感防護罩而引起恐慌的事件存在，這些具有重大後果的關鍵時刻可能會使得能動者對其相關的常規習慣產生質疑，並必須準備面對一整套新的風險與機會。相對於日常生活中多少有點固定的事物及只能順其自然的命運，這些關鍵時刻使得個體會因為自己所做出的決定，而對往後的自我軌跡產生重大的影響。

紀登斯（1991: 126-133）指出這些關鍵時刻有些是必然降臨到個體身上的事件，如生老病死，但也有許多時候是個體刻意培養與追求的，許多制度化的風險環境及個人的冒險性活動都構成了可以主動創造命運的情境。這些情境往往要求個體與自己、他人或物質環境進行競爭，而競爭要求投入，並會產生因為暴露於不確定中所造成的激動感。這些冒險活動具有三項可辨認的特徵，分別是面對危險的意識、主動面對危險的態度，及克服危險的自信心。這種冒險也是對本體安全感的一項實驗，並對自我認同具有重大意義，亦即它是一種自我證明及自我表陳的活動，有助於個體培養「存在的勇氣」與證明自己的存在。換句話說，刻意追求的冒險是刻意打破例行性，其心理學上的驅動力，乃是其可能具有的立即而清晰的滿足。這種冒險要求個體脫離現狀，但需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如果個體不做慎思性的冒險，則將繼續陷入現有令自己不滿的情境中，如果未做好準備即冒失上路，也可能因此終結自己。

4.面對風險的策略之二：建立信任關係

人們面對風險能夠維持本體安全感的另一種作法，是對他人或專家系統給予信任。信任不同於傳統信仰上帝之類的觀念，也不只是將熟悉事物理所當然地認定其不會改變，或基於過去經驗或趨勢進行歸納推理，而且還是一種「跳入」某種承諾的信念。它與不在場或無所知有關，並使人們能夠擱置自身對某一方面事物的有限知識或技術，但它不一定是人們有意識地採取的決策結果，更主要是心

智的一般態度。此態度植基於人格發展的紐帶之中，與人的心理安全感有關，也與現代性的內在反思性有所關連。亦即信任是一種跨越未來時空的承諾或保證，面對無法獲得充分資訊（但仍有部分的基礎資訊）、不在場或可能有偶發性結果時，在不同的選擇中，選擇其中之一交付某種信賴的狀態。因此，紀登斯（1990: 34）給予它如下的定義：「在關於一組特定的結果或事件上，對某人或某系統的可靠性給予信賴，這種信賴是對他人的誠實或愛，或某種抽象原則正確性的信念的表達」。信任使人們在面對未來不確定時，能將許多事情加以擱置、保有期望及安全感。這種信任本質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非理性與盲目，但它卻也必須具有相互性，亦即信託者必須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回報，才能讓信任感持續下去，而這些回報主要是從個體的成長經驗中獲得。

但對個人的信任與對抽象系統的信任卻有本質上的差異，紀登斯（1991: 7, 133-143; 1994b:91）指出現代抽象系統在很大的範圍內為日常生活創造了相當大的安全感，大大地降低了前現代社會所蒙受的眾多不確定性。但這樣的進步卻也使人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第一，對專家系統的信任無法獲得如同對個人的信任中所能獲得的道德回報；第二，抽象系統侵入日常生活也產生了個人可能不知所措的風險，而越多的依賴，可能產生越大的易受傷性；第三，自然終結之後的社會化自然在某些方面較過去的自然更不真實，更難精確評估其風險。這些代價與日常生活諸多方面發生「去技能化」（deskilling）現象有密切關係。

5.面對風險的策略之三：再技能化

紀登斯（1991: 137-139）指出「去技能化」現象的成因，一方面是因為許多知識或技術為專家所獨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因為沒有人能夠成為各方面的專家，因此人們的生活不得不要受到眾多專家系統的影響，而自己所能做的僅僅是對這些知識表層進行粗淺的加工，失去充分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這些抽象系統造成日常生活的去技能化，對能動者的自我而言是一種異化與破碎化，它使

得傳統社會中所存在的地方性控制或個人對地方的熟悉感消失了。但這並不是權力從一些人身上轉移到另一些人身上，而是現代性所產生一種沒有人能夠直接控制的社會影響模式。

但是抽象系統並不只是造成剝奪的效果，它也會產生增權賦能的效果，因為伴隨著抽離與重嵌，抽象系統可以增加權力的總量，透過改變物質世界及轉化行動的條件，提供過去世代所未曾擁有的機會。亦即透過再融攝（reappropriation），常人的信念、實踐與抽象系統範圍之間的無數空間被打開了，個人獲得在特定決策及深思性行動方面，部分或全面再技能化（reskilling）的可能。換句話說，不論是在工作領域或生活領域中，能動者都會在被去技能化之後，持續努力地創造各種再技能化的新技術，對知識與控制進行再融攝，盡可能使自己在行動時都是具有技巧及認知能力的，並形成控制辯證。

在關鍵時刻，亦即當有重大的改變發生或必須做出重大決定時，再技能化可能會更深入，因為當個人覺知到某些事物的重要性時，就會有更大的動力去花更多的時間及精力，對相關知識與技能進行更深入的了解，這不僅會影響到後續的生活風格，更會影響到個人自我認同的反思性計畫。此時各種專家知識可能對行動者解釋自己及他者行動方面扮演著修正及改進的功能，但不一定具有絕對的影響力。而且，由於現代社會中專家知識是開放的，任何一個人只要投注夠多的時間及資源，都有可能可以獲取而產生「再技能化」。

然而，再技能化卻永遠不可能完善。一方面，因為人的精力有限，必然需要與其他方面的專家知識相接觸。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社會制度性反思的特性，使得專家理論、概念及發現會不斷地以近乎自動的方式反饋到大眾身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習慣與期望，同時專家知識又具有修正的可能以及不同見解之間的論爭，使得人們對專家知識呈現著信任、懷疑、接受、拒絕等等混合的態度，也充滿著不確定性（1991: 139-143）。

因此，不僅專家對抽象系統的脆弱及限度有所認知，一般人也不會對抽象系統給予盲目的信任，同時儘管能動者無法自每一個專家系統中抽身離去，至少能夠有所選擇，進行所謂的「努力面向的協商」(effort bargain)，亦即將自己的精力與時間投入一些專家系統中，而將另一些方面以信任的方式交由其他專家，也就是自己掌握（獲取）一些專家系統，而信任另一些專家系統。

6.不確定性的持續：反身性作用與人爲不確定性

風險與信任的觀念固然反映了現代人不同於傳統的生活方式，但也充分表現出現代性對人們所產生的反身性作用。紀登斯強調現代社會的風險是我們無法逃避的，如生態危機、核子戰爭、戰爭的工業化、全球資本主義機制的崩潰、結合政治軍事與意識型態的集權式超強國家誕生等等，這些都不是我們不去冒險就不存在風險，無論是生活方式或是物質環境方面，世界都已經演變到我們無法不受到同爲人類的其他人的影響。亦即由於現代社會反身性的特徵越來越基進與普遍，風險的影響也越來越普遍，許多原來看似無關的事物已經變得越來越有相關性，例如經濟與生態兩個從前被視爲不同向度的風險，現在往往必須被連結在一起來看待。

但是否可以說現代社會的風險越來越高呢？紀登斯（1998:102, 219；1994b:58）卻不做如是觀，他認爲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爲風險社會只是因爲風險越來越成爲中心概念，以及風險種類不同的關係，或者說過去是以非人類相關因素的「外部風險」爲主，而現代則是以「人爲的風險」或「人爲不確定性」爲主。外部風險是指那些雖然無法預料其發生，但尚屬規律，且對人們而言普遍可預知，而能採取保險措施的風險；人爲的風險則是因爲人類科學及科技的發展，所產生的過去絕少經驗而無法確切了解的風險。其原因不只是人類越來越多地涉入原先屬於自然的範圍，也由於高度可變性的資訊社會中的各項社會變化，還因爲知識本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現代初期自然科學的建立者樂觀地認爲可以將知識

建立在確定的堅實基礎上的想法，已經被波普等人所推翻⁶，啓蒙以來人們相信知識越多、控制越多，因而人們越來越能導引世界朝向我們的理想狀態前進的現象並未出現，事實甚至是我們越試圖拓殖未來，未來越可能以令我們吃驚的方式跳出來。儘管如此，我們仍有需要對這些現象發展一些制度上的分析，只是我們必須體認到過去啓蒙諸賢所欲尋求的知識確定性基礎已經被證明為不可能，科學知識依靠的不再是證據的歸納累積，而是方法論上的懷疑，這種現代性中組織(秩序)、掌握與極端懷疑相互連結的關係不僅成為哲學家的困擾，也成為普通人的存在性煩惱。但無論如何，當人們對現代性的雙刃特性有所警覺之後，一方面會對這種風險社會中開放的可能性進行各式的評估，並對持續遭遇各式各樣新的可能性與風險有所準備。另一方面，則會反思地進行各種反事實的思考，形成一種弔詭式的「例行性的反慣例化」。

(三) 去傳統化

紀登斯(1979: 8; 1998: 127-129)一方面承認傳統的存在與意義，另一方面也主張現代與傳統的斷裂，現代性是一種後傳統的秩序，傳統必須先被問題化之後，透過辯證證明其意義與價值之後才能以符合現代需要的新姿態出現，並且必須基於未來的反事實性來思考與行動。

1. 傳統的意涵、來源與批判

紀登斯(1998: 127-129)指出傳統是過去存在於現在，並影響未來的一種方式或媒介，那些由群體所擁有，以儀式性與重複性宣稱具有真理的事物，都可能成為傳統。它的功能是藉由共同的記憶來傳承經驗，並提供行事的架構，讓人們

⁶ 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雖然受到費若本的批評，但根據苑舉正(2003)的分析，兩者的主張在知識論上其實僅僅有程度上的差異。紀登斯也指出波普乃是庫恩、拉卡托斯及費若本等人在建構科學哲學時的跳板(1976: 14)。

有所遵循。因此，傳統不能被視為只是保守主義的論點，事實上人們常常基於情感性因素或其他的原因來重現過去，而且每一個社會都有長期發展的制度性沈澱所形成的特色，只有把握住這些特色，才能真正開始著手研究社會變遷。

但紀登斯也指出傳統與習俗並非既定與必然的，它總是可能有以下各種特性中的幾項：「無中生有」、刻意被權力建構出來、用以合法化新的權力系統、隨時間推移而演變、不斷地被發明與再發明、被多元地加以解釋，會突然改變或轉型等等。亦即傳統並非都是淵源久遠、一成不變，且它很可能被利用來作為權力正當化的工具，甚至變成一種強迫。

因此對於許多人懷念甚至主張回復到過去「黃金歲月」的各項制度與措施，紀登斯指出傳統並不如這些人所想像的那麼美好，反而是現代社會有更多的機會對過去的事物進行反思與對話，更值得珍惜。而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fundamentalism) 只是一些所謂傳統的「守護者」，佔據特殊的詮釋地位與權力，宣稱掌握對世界唯一正確的見解，他們採取不容忍異見與拒絕對話的方式來對抗不斷追問理由的世界主義，(弔詭的是他們卻運用現代科技來推廣其教義)，這種主張將有使暴力尖銳化的可能，因此必須將以拒絕。

但紀登斯也從基本教義派的思想中找到其正面意義，他(1998: 131-132)指出基本教義派某種程度上正確地對推動現代前進的文化力量——科學與技術——提出質疑，因為科學與技術都依賴於一項假設——沒有任何東西是神聖的，此一原則若推至極致，將使生活變成令人無法忍受。因為如此一來，我們的生活將不再存在有任何的道德秩序。因此，紀登斯主張任何希望世界主義興盛的人們都不能夠抱持極端的懷疑主義，而是必須在投入與懷疑之間取得平衡，而且這種平衡取向已經逐漸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展起來。

2. 去傳統化的意涵與效應

紀登斯（1998: 129）指出由於全球化與反思性增長的結果，不論是公共機構或社會日常生活領域都已經日益去傳統化。去傳統化並非指傳統的消失，只是因為人們越來越採取更理性、更開放、更周詳思慮的方式來對待世事，而不再相信不可見的力量，因而使得傳統不斷地被撤空、挖掘與問題化。亦即傳統不再能以傳統的方式存在，不再體現出既往之事對日常生活連續性所享有的具有道德意涵的管轄權力，而必須以符合人們需要的方式加以重塑。

在自然「終結」與傳統「終結」之後，人們生活在一個無時無刻都得做出選擇的「個人化」社會中，亦即每個人都必須決定什麼才是自然與傳統，以及如何組織與自然和傳統有關的生活，其中有各種的機會，但也存在有黑暗面。紀登斯指出在這種社會中可能出現自主的個人，也可能出現強迫症與「成癮」的個人，不論是耽溺於工作、運動、飲食、性或者甚至於愛情。由於受到焦慮與不安的驅使，個人可能受到特定生活習慣及其中重複及固定化的快感引誘，陷入惡性循環中，沒有這些特定的事物，就幾乎無法生活下去，此時人的自主性是遭到凍結的。這種強迫症也是一種凍結式的信任，因為它是在許多不同的備選方案中未經仔細考量即選擇其一，輕易地投身其中，使得信任成為簡單的重複衝動。這當然不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亟待利用各種方式來重新創造與再創造自我認同與自主，並建立一種相對穩定但不落入強迫的生活方式。但樂觀的紀登斯還是強調我們不應該只注意到風險的負面意涵，也必須注視風險所帶來的積極正面的意義（1998: 133-135; 陳其邁譯，2001: 51）。

3.以未來的反事實性看待歷史與傳統

紀登斯對歷史的看法與其對去傳統化的看法是相關連的，亦即他認為歷史必須以向未來開放的角度來看待。他認為應該區分歷史（history）與歷史性（historicity），對後者他主張應該將之定義為：「運用有關過去的知識來形成與過去決裂的現在，至少，只支持那些可用符合原則的方式加以證成的那些過去。」

在下面一段的引文中，我們更可以看出紀登斯「向前看」的立場：

歷史應該將我們導向未來。未來應該是開放的，而且……具有依行動過程而定的反事實性，這是現代性狀況之所以可能及必要的時空延伸之基礎觀點。未來學——對未來可能性的標示——比將過去標示出來要更為重要。……與天意歷史觀的決裂、基礎論的銷解、反事實性的未來導向想法，以及經由不斷的變化將進步「空出」的作法，與啓蒙初期的核心觀點有著極大的不同，這樣的差別來自於對現代想法的自我澄清，以及對傳統遺風及天意式觀點的清除（1990: 50-51）。

第三節 基進現代性或後現代性

至於當前社會是基進現代性，或是後現代性？以及我們應該繼續保留現代主義或轉向後現代主義？紀登斯的看法是我們可能邁向後現代性，但卻並非藉由後現代主義來達成，或者說他所主張的後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者所主張的後現代性是不一樣的，這牽涉到他對現代性境況及後現代性境況、基進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的理解及定義方式（1990: 45-53）。

一、對哈伯瑪斯的批評

紀登斯認為哈伯瑪斯關於現代性的論述提出了幾個重要的議題，但有其限制。紀登斯指出哈伯瑪斯的文化發展觀是演化式的，而且他透過溝通理性的體現來關心自主與正義，這種解放觀只是現代性文化的一面。事實上現代性透過各種新社會運動形式，展現的不只是解放的旨趣，更顯現了有關生活政治學，諸如生活風格、兩性關係及文化特色等議題的重要性。另外，哈伯瑪斯和帕森斯一樣都

主張規範內化的觀點，似乎權力關係與衝突不再重要，而且他所描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現象也忽略了人們作為能動者，具有主動地將專家知識納入自己的生活中，而不受到工具理性支配的能力。因此，紀登斯所要建構的理論是一個更具有批判性，且不忽略現代性遺產的理論。他相信當代世界已經發生許多變化，新的社會運動提出了新的社會議題，這主要是關於在世界脈絡中文化認同的問題，這個問題又以溝通科技的進步及承認文化差異的重要性為其標誌。

二、反對後現代主義

紀登斯同意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所提出的一些批評與主張，例如現代性將一些不容易納入其範疇中的特定群體加以排除或邊緣化、知識的基礎是脆弱的、歷史沒有內在進程、新社會運動提出了新型態的社會議題、現代世界中的個人認同不再那樣穩定並更片段化……等等。但紀登斯對後現代的教條卻無法接受，他認為後現代主義沒有把握到社會世界的制度性變遷現象，其所主張的主體的消失也沒有考慮到人們主動瞭解、組織及改變生活的能力。他認為後現代的解構傾向其實只是激進現代性反思現象的邏輯延伸而已，也就是說由於反思性透進了個人及制度生活的再生產中，使得傳統不斷地被重新思考並問題化，人們的社會實踐不斷地收到關於該實踐的訊息而重新組織。然而人們不可能過著破碎而不連結的生活，每個人都必須建構自己的自傳論述，因此即使在解構的同時，人們也將努力維持著一定的連貫性。

另一方面，紀登斯對後現代主義採取消極性的理解，他認為後現代主義對解決高度現代性的問題並沒有太大的貢獻。或者換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因為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採取消極面的態度對待，才使得紀登斯對後現代主義的主張採取保留的看法。紀登斯（1990: 150）認為後現代主義是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理解當前的轉變，其對當前社會的轉變得到具有以下特徵的看法與主張：（一）所有知識論

都已被消解；(二)應該把焦點鎖定在當前社會變遷的離心傾向及其錯置的特性；(三)認為自我因為經驗的片段化而被消解了；(四)主張真理宣稱有其脈絡性或視其為「歷史性的」；(五)認定個人面對全球化的趨勢充滿無力感；(六)把日常生活的空虛視為是抽象體系介入的結果；(七)認為對等政治參與被脈絡優先性和發散性所排除；(八)定義後現代為知識論、個人、倫理學的終結。由此觀之，紀登斯是將後現代主義視為是對高度現代性採取的一種虛無主義式的對待，基於對後現代主義如此的理解，紀登斯認為後現代主義的內容不如他所提出的基進現代主義，基進現代主義對上述後現代主義所提出的相對主張是：(一)必須尋找造成零碎感與分散的制度發展；(二)將高度現代性視為是由分散與深刻的全球整合辯證地連結在一起的；(三)不只將自我視為不同力量交錯的所在，並認為因為現代性而使反思性自我認同的主動過程成為可能；(四)認為因為全球化問題的優先性，使得真理宣稱的普遍特性以一種無法抵抗的方式強加在我們身上，現代性的反思並不排除系統性的知識；(五)透過經驗與行動，分析無力感與增權賦能之間的辯證；(六)將每日生活視為是對抽象系統主動而複雜的反應，其中有失有得；認為不論是在全球或地方，協調式的政治參與都是可能且必要的；(七)將後現代性視為超越現代性制度的可能性轉化⁷。但就如黃瑞祺(2002: 83, 90)所指出的，紀登斯的部分主張已經是具有「後現代性色彩」，並與傅科、哈伯瑪斯、李歐塔、列維納斯等人的倫理學遙相呼應，使得「現代派」及「後現代派」有著重要的匯合點。

三、基進現代性的特性

紀登斯(1990: 45-46)認為我們並沒有超越現代性，而是生活在基進化的現代性時期，雖然不排除我們有可能對現代性的各種制度叢集進行內在的轉化或超越而邁向後現代性，但就現今而言，我們仍處於現代性中。這種基進的現代性本

⁷ 紀登斯雖然稱這部分的比較是關於後現代性與基進現代性的比較，但從其行文脈絡中可知他所要作的是後現代主義與基進現代主義的比較。

身就將表現出其不安定性，具有四大特性：基礎論與進化論的銷解、歷史目的論的消失、承認徹底且構成性的反身/反思性，以及西方特權地位的消失。而現今的狀況應該被視為是現代思想的自我澄清而不是後現代性，而這些基進的現代性將帶領我們走向一個全新而動盪的世界。

紀登斯（1990: 47-49）指出反基礎論是哲學上的一大轉捩點，但它卻不只是後現代現象，而應該被視為是現代性越來越被瞭解。因為啓蒙理性從中世紀基督教文化中發展出來，其最初形式是以「神授的過程」取代「上帝的意旨」，亦即啓蒙諸賢主張因為上帝賜予人們理性，因此人們透過理性思考所得乃是正確無誤的，這是一種「神啓式」理性（providential reason）的觀念。但與此相反的虛無主義也在啓蒙的最初時期即已灑下種子，因為如果理性是不受束縛的，則沒有任何的知識是建立在確定的基礎之上，即使最確定的概念也只是原則上正確，或者說是在受到進一步檢視之前是正確的。隨著反思現代性或者高度現代性的到來，人們越來越認清人類是靠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其背後並沒有諸如上帝之類的外在者給予一定的保證，或讓人類能夠越來越「進步」。較明確的反基礎論可以追溯到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與海德格，他們都認為啓蒙諸子的現代性概念是將歷史發展視為人們不斷獲得關於知識的理性基礎的過程，但他們兩者都反對這樣的看法，只是他們又無法另尋一個有力的基礎對之進行超越，因而完全放棄了批判性超越的概念，而走向虛無。此外，尼采也讓我們認識到理性的循環性及理性與權力之間不確定的連結關係，現代性的理性循環的核心已經成爲一個謎，而且我們也無法解開這樣的謎。

四、基進現代性的可能走向

至於現代性的未來是怎樣的前景？紀登思則抱持開放的立場，他既不同意韋伯所主張的現代性將使得理性束縛越來越牢固，人們將被囚禁在科層程序毫無個性的牢籠中，也反對馬克斯學派將現代性視為怪物的看法。他使用了一個加格諾

式巨型卡車（juggernaut⁸）的比喻：

人類全體的集合，就像一個具有巨大力量的無法完全控制的巨型卡車，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控制，但它卻也有可能失去控制，並將自己撕成碎片。……乘坐在上面，絕對不會是完全不愉快或沒有回餽的，它經常是使人高興且讓人具有希望的。但是只要現代性的制度存在，我們就沒有能力完全去控制這趟旅程的路徑或速度（1990: 139）。

但是這樣的比喻還是有其限制，紀登斯自己也指出現代性裡面其實充滿著張力與矛盾，必須從一種辯證的角度來觀察。他為現象學列舉了四個描述現代性辯證發展的相關經驗框架，分別是：非地域化與重嵌、親密與非個性化、專家系統與再融攝、個人化與涉入。亦即人們將在疏遠與熟悉、個人間的信任與非人性的連結、抽象系統與日常生活的認識能力、實用性的接受與積極行動等四組因素的交會中選擇自己的未來方向。我們也可以看到現代性其實是在組織與不確定性之間的擺盪，一方面人們企圖掌握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卻又隨時面臨失去掌握的可能。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紀登斯認為從現代社會的狀況出發，既有可能導致更悲慘，也有可能導向更幸福的人類狀況，基進的現代主義並不抱持悲觀主義，而是要更積極地瞭解導致現況，以及人們對現況不滿的原因，並努力尋找出路。雖然他對後現代主義的理解不見得會被後現代主義者所接受，但批評紀登斯為「最後的現代主義者」，卻也未必合理，因為紀登斯對現代社會的現狀並非完全滿意，他也不排斥情感等因素，對理性也並非抱持完全正面的態度，他也相信人類社會不一定是一直會往「進化」的方向前進。他所企圖主張的是無論是依照

⁸根據韋氏大字典（Merriam-Webster OnLine），加格諾在印度神話中為毘濕奴神（Vishnu）的化身克里須那（Krishna）的神像，每年例節用車載神像遊街，相傳若能被車輪碾死者即能升天，但事實上則是因為其失控而使信徒遭到碾斃。此處紀登斯之意，是隱喻與實體相互交錯，指現代性如同巨型重量級卡車一般，具有勢不可擋，會壓碎一切阻擋於其前行之路的巨大力量，但其本

理性、感性或宗教信仰來過生活，我們都是依賴自己的思慮來做決定，並且承受這些決定所造成的結果的影響，至於我們的選擇會有怎樣的結果，卻無法得到保證。

從啓蒙以來，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曾經樂觀地相信並倡導人們應該靠自己的理性來做決定，也認為人類社會將能不斷地進步，這個時期即是所謂的「簡單現代性」時期。但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人們的貪婪慾望，以及各種非預期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導致啓蒙的理想與承諾落空，使得後來的人們深感不滿，對現在社會及世界的狀況，有人稱之為「現代主義的失敗」，有人認為已進入「後現代時期」，但紀登斯則稱之為「現代性的基進化」，也就是人們越來越認清人類是靠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其背後也沒有任何外在者給予保證。因此，人類社會的發展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方向及可能性，不再是以歐美為中心，也不再是「進步」的西方影響其他「落後」的地區。許多後現代主義者看到現代性興起與發展逐漸形成霸權，並導致啓蒙理想的失落，因而採取虛無主義式的因應方式，但紀登斯則認為現代性所產生的不只是問題，也同時存在有機會，不需要也不應該以消極、虛無的態度面對之，而應該採取積極而又謹慎的態度尋求人類的出路。

第四節 教育上的衍釋

紀登斯對現代性的意義、特性、制度、動力與後果進行分析後，發現現代社會既有強調組織控制的部分，也有極端動態與不確定性的部分。由於傳統與外在世界都失去其固定的意義，使得人們越來越了解到環境雖非自己完全能控制或選擇，但歷史卻可以且必須是靠人類自己來決定的。一方面人們會參酌所能獲得的

身卻又很可能失控。

更廣泛訊息，對時空加以重組、加強監控，並對知識訊息進行反思性的利用，決定哪些事物要交由抽象系統去處理，哪些事物要自己掌握；另一方面，世界的去自然化、去傳統化與知識的反身性作用，卻也產生許多無法預期的風險。這些分析對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啓示，分析如下：

一、現代社會呈現極端動態性與不確定性，必須隨時因應環境的變化而調整制度結構與策略行動，因此教育內容與形式的改變將成為常態，宜保持充分的彈性，解除不當管制，只保留符合教育價值的管制。

由於現代性受到時空分離、延伸與重組的影響，加上抽象系統與人類行動者的反身/反思性作為的影響，呈現極端動態性與不確定性。社會情境的改變迅速，教育措施也必須因應這樣的社會情勢而有所調整，因此，雖不必然常常發生重大的教育改革，但持續的教育發展將不再稀罕，過度僵化的管制，會導致失去彈性，不利於迅速的應變，有必要加以去除。

另一方面，「鬆綁」應該是新的結構取代舊的結構，而不是放棄所有的規則及資源。一般意義之下的鬆綁（deregulation），意指解除管制，是解放政治學或解放教育學中的一種看法，但解除制度或思想觀念的束縛、權力下放之後，卻不能夠只是放任自為，過去有些教師誤解「開放教育」的意義，將其等同於完全放任，當然會導致失敗。事實上，教育措施鬆綁應該是「有鬆有綁」（黃炳煌，1996：3-9），deregulation 之後要有 re-regulation，有權就相對地有責。除了各機關的工作人員有必要自我負責、自我管制、達到應有的水準之外，所有的能動者都有必要積極辨明正面的教育形式與內容，對各教育機構、教育工作人員、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相互與自我內在的監督、質問，使不致背離教育的本質。相對地，有關教育的各項方針、目標、規準及原則的制訂宜以是否符合教育價值為判準，而非只注意其是否符合特定形

式，這樣才能維持多樣性與創造力。無論如何，從處處限制的「管理——控制」走向「自主——監督」（黃武雄，1997）則是必須走的大方向。

另外，雖然不確定性已是事實，但對事實有紮實的認識，並據以發展具體策略仍有其必要，才不會造成閉門造車、僵硬被動。近一、二十年來的教育改革中，許多國家的教育最高行政單位，都會因應不同的需要與方向而進行組織的改組，甚至連名稱都有所更迭，如英國教育部 1992 年更名為「教育暨就業部」，2001 年更名為「教育暨技術部」；澳洲原來的「教育、訓練暨青少年事務部」，2001 年更名為「教育、科學暨訓練部」；韓國在 2001 年將教育部升級為與副總理同級，並更名為「教育及人力資源發展部」（郭重吉、張惠博，2005: 24-25），都顯示其積極因應時局所做的調整。我國政府面對世界趨勢，若要宣示其施政方向與重點，帶領國家整體教育的發展，教育行政的體制與人員的選任也可考慮有所變革。

二、「組織」與「秩序」是現代社會的必然現象與必要條件，不應輕言放棄，而流為放任自為。但現代性教育制度有若干加強監控、管理，並強調效率的傾向，卻可能導致無法創新及壓抑了活潑的生命躍動，無法應付越來越高度複雜的反身/反思現代性，而出現反省的呼聲。

世界各地區的現代教育制度都受到其傳統的影響，有些地區是由國家機器發動，有些則是由民間所開啓，其監督控制或獨立自主的程度自然有所差異，而且教育制度的設計也始終參雜著各式各樣的思潮、目的與目標。但隨著傳播與交通科技的發達，時空因素得以抽離與重組，而有若干全球趨同化的現象。尤其是工業資本主義普遍化之後，學校作為教育的專業機構，受到工業主義、資本主義、軍事主義、國家機器個別的思想邏輯或彼此聯手的影響極大。雖然教育制度仍有其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一定完全符應上述制度

的影響（李錦旭，1998），但許多國家的教育發展趨勢是一方面將教育從人格的啓發轉變成知識技術的訓練，為這些主導勢力的擴張培養所需的人力，另一方面也大幅度增加監控的程度，以增加效率，並確保掌權者的利益及現有制度與價值得以運作或再製（楊深坑，1997；周淑卿，1991）。

雖然監控不一定都是要遂行與教育本質無關的目的，且一定程度上監控有其需要，許多學者也都在努力地修訂各項指標以改進監控及評鑑的效能，但如果不是透過共識作為推力，則監控往往會流於只重視表象而忽視內涵的後果，或被用來作為政治操弄的工具。因為各項指標很難完善，而不當的既有指標常常忽略不易觀察、不能量化或不受關心的部分，使得許多教育產生偏差，如目前許多學校重視的往往是合唱團訓練而非音樂課，是美展比賽而非美術教育，是體育團隊而非體育教育，是特殊技巧而非普遍的素養，是特殊班秀異學生的表現而非一般與特殊弱勢的學生，是學科表現而非生活能力……。其後果是道德教育與學生輔導流於形式，相關課程成為擺置不適任教師或無關重要的配課，學生情意方面學習的狀況無人關心。日常生活方面淪為管理主義，相關行政管理的規定多如牛毛，卻往往瑣碎無謂、因噎廢食，甚或不知其義，如為了秩序讓有創意的討論失去機會，為了「衛生」問題讓學生必須屈就特定的餐飲廠商……。雖然表面說法乍聽之下或許言之成理，但實際上卻經不起進一步的質疑。

即使這些作法及其動機與目的未必完全錯誤，但在無法獲得充分溝通以形成共識、了解及尊重的狀況之下，其不良的結果往往是讓師生不能真正了解各項措施的教育用意，形成鬆懈、敷衍與消極作為的心態，或是將不當的作為當成達到個人利益及目的所需進行的交換行為，生命活潑躍動的本質在扭曲的監控之下往往受到無情的壓抑。對於上述現象及背後的原因，學者與有識之士的批評已經相當鞭辟入裡（王震武、林文瑛，1996；黃武雄，1997），如管理主義、升學主義、菁英取向等等，但其改革仍欠缺實效。

三、現代社會時空沒有一定的內容與意義，教育工作者與學生宜重新思索如何對時空重新加以消融，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教育學。

傳統中時空總是必須與特定的事物相連結，而現代性的時空則有純然、空洞化的現象，亦即不與特定事物產生必然的連結，正因為如此，使得時空具有被再消融（re-appropriated）的可能性。但如果我們不積極地將時空內涵依照自己的經驗、判斷與價值來加以組織、賦予意義，則它就將被他人的規劃所佔據或形成一種耽溺，而我們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其自由性。

因此，對教育工作者而言，在忙碌的現代生活中，選擇我們所要的生活，分配我們的時間與精力，就是將這些時空中的舊有內容加以消融，賦予新的意義，這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在誠實面對生命價值時的重要考量，可說是一種「生活教育學」。例如教師生涯是要年復一年地重複著同樣的教學，數十年如一日，抱持「混一口飯吃」的心態，從不力求改進，只希望在既有體制之下安逸地過生活，還是不斷追求專業成長，並成為具有批判意識、為弱勢伸張正義的公共知識份子，積極面對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命，嘗試著用各種方法來促其生長茁壯，再如在國民教育階段，一些所謂的「配課」、「副科」是要將之當作加強學科考試能力的時間，或是休息打混的鐘點，還是要切實地與學生共同操作、討論對其未來深具影響的美感經驗、勞動意義、價值觀念、休閒安排等等。此外教師只是將自己單純地定位為教書匠，離開教室之後學生即與自己無關，還是要與學生生活在一起。這些態度與作法都將影響每一個學生與未來社會公民在道德與美感上的素質，也將影響到教師的自我定位與認同，因為每個生命都將隨著時空而變化，存有在死亡之前永遠必須是進行式的（to be is to becoming）。

這個原則對學生同樣適用，雖然許多學生的時間往往受到家長片面地填塞，無暇對生命進行思考，而另一些學生則是漸漸耽溺於電玩、網路、電視

中，無法自拔，或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也未曾對這種生活是否值得進行思量。但正因為上述這些學生都缺乏對生命更廣闊的視野，教師更需要一方面透過生涯教育與生命教育，來協助學生打開其視界，協助其思考生活與生命的意義，另一方面，積極地輔導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擺脫過去未經反思就陷溺其中的不當作息。

四、高度現代性社會中容易因為抽象系統而導致隔離現象，教育宜謹慎因應，並設法積極地反思應用各式的抽象系統，從事更高層的消融及創造。

過去許多工作的完成往往需要個人從頭到尾包辦所有大小事務，但高度現代性中，則呈現分工的現象，不同的事務都有不同專家系統可以負責，然而這樣的分工卻也可能導致隔離與忽略道德議題的現象。教育方面亦然，如國中以上的科目都已經需要專門的教師進行任教，許多家長或導師已無力或認為無責任全面指導學生的課業，因而放任學生「自求多福」；道德議題或生活常規也容易被視為只由少數教師或行政人員負責，其他人則放任不管、視而不見，或礙於「權責」，無能為力，這種抽象系統所導致的隔離現象必須審慎因應，否則將使人感到失去意義或充滿無力感。例如，大部分的學生如果家長沒有一再強調教育的重要，並給予適當的關心與環境，而只是抱持「能讀就讀，不能讀就算了」的想法，則即使教師再如何努力，學生成就通常都是偏低的，因為學生處於兩套不同的規則當中，很難真正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這一點是所有為人父母必須重視的地方。因此，即使家長無力給予子女課業上的指導，也仍有必要表示重視、給予關懷與支持，並與學校充分配合，培養子女正確的態度與意志，才能有所長進。

另外，一些專家系統也可以被反思性地加以利用，從事更高階的消融與創造，例如雖然科技發達、工業化大量生產甚至複製之後，產生的負面後果

是大量的浪費、環境破壞、大規模戰爭與生命的毀滅，以及產生「無物能夠保有神聖」等效應，有人甚至擔憂教師的工作可能被取消，學生只要透過電視、廣播即能學習，師生的互動不必存在，氛圍與聖地亦不復存在（方永泉，2002）。但大量生產的正面效應則是許多物質與資訊不再匱乏或侷限於少數人所能擁有，而且透過教學媒體呈現教室內不容易操作或體驗的過程，可以彌補學生經驗的不足，而不需僅憑藉想像力來學習。利用網路、電視、錄影、錄音設備，還可以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機會，而非只有一位教師的一次教學，而且讓學生透過上述設備反覆學習，還可以節省教師指導的時間與精力，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用在更有意義與價值的部分，如帶領學生學習如何獻身於特定領域，或關心學生的生活與學習狀況，使得師生的關係由現代社會的趨勢——不投入感情、只關心特定方面、只用絕對而一致性標準進行評量、以教師自我的旨趣為導向（陳奎熹，1990：263-265），重新回歸到重視師生情感、廣泛層面的關心、用個別而相對標準評量學生、以團體的旨趣為主要的導向，或至少達到較平衡的狀態。

同樣地，金錢作為一種象徵性符號，具有抽離、擱置的效果，一方面有使得各行各業等值、貴賤尊卑模糊化的效果，另一方面，卻也使得人們產生一切向「錢」看與拜物主義，甚至願意用一切來換取金錢的態度。但金錢終究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尤其是與個人存在與道德相關的問題，因此必須時刻警惕金錢所可能產生封閉、隔離與壓抑的後果，重新將金錢所無法滿足的價值恢復起來，例如，許多家長對待子女是以金錢的充分供應替代言語的關愛與彼此的相處，以送至補習班補習代替功課上的關心，到最後得到的結果，往往是不懂得感恩的子女，這種擱置所得到的壓抑，其實非常不值。當然，金錢也並非必須絕對排斥的抽象系統，一些原本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教育資源，也可以透過一定的商品化包裝，加以推銷，增加其能見度。也就是說，面對無法脫身其外的抽象系統，我們有必要一方面重新檢視並關心可能被壓

抑的部分，另一方面尋找可以採取的更高層次消融。

五、高度現代性中個人及社會都是反身/反思性的構成，呈現去傳統化與反事實性現象。教育工作者宜具有隨時接受質疑並為其措施的正當性提出論證，以及反現實思考的能力。

在去傳統化的現代社會中，各項傳統、結構、制度都不再能夠因其曾經出現或因是「現實」的一部份，即具有正當性。因此，教育的各項制度與思想一方面要自我反思其價值與意義，一方面要接受不斷的質疑及檢驗，不能視為理所當然，不能有因為其存在必有其價值與功能的保守想法。任何一種教育作法的支持者都必須向質疑者證明其正當性，而當質疑者不能獲得滿意的答案時，即可能有不同的主張出現。

當然每個人都是處於歷史之中，會受到所處時空的歷史及社會所影響，其中的各種傳統都可以是一項重要的資產（資源），也是個人免於失根、免於缺乏歷史深度所必須，但除了珍視長久歷史積澱下來的文化遺產之外，也宜有基於未來的反事實性所做的思考，勇於創新，迎接挑戰，才能賦予傳統符合時代需求的新意。

六、全球化的正面意義之一是使得人們可以獲得更多參照與比較的機會，形成普遍化的民主潮流。而面對全球化，教育措施宜有個人、地方、國家等不同層級的思考，才能參與全球社會的建構，為自己定位，同時對社會有所貢獻。

全球化雖有其可能的弊端與負面效應，但全球化並不一定會如許多人所認為的產生資本主義普遍化的結果，而且資本主義本身就有不同的類型，執政者也會有不同於資本家的思考，如果加上各種社會團體的運作，以及歷

史、文化與外在因素交互影響，世界各國的制度其實都是獨特的產物。

但國情不同並不能成爲拒絕改變的理由，全球化的意涵主要是指世界各地的人們相互間的影響日益緊密，其正面意義是使得人們可以獲得更多參照、比較，並從互動中得到共同演化的機會，不再閉門造車，也不再受到少數人意識型態的蒙蔽與欺騙，而能形成普遍化的民主潮流。因此從近期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趨勢來看，固然有順從工業資本主義，從較開放自主的教育制度向增加監控程度傾斜者，但也有從民主、民權的立場出發，要求從原先管制嚴格的教育制度鬆綁出來的現象與呼聲。

因此，所有的能動者都有必要更了解自己與他人，並且從自身、地區、國家與全球等不同的層次思考如何讓自己與他人生活得更幸福、更有意義。過去只基於國家立場，並要求全國一致的教育制度與思維已經過時，個人、地方與國家都必須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尋求自己的立身之道，並透過全球性的思維與合作，共同維護全人類的福祉。因此，發展鄉土教育並不一定需要將其視爲增加學生負擔或加強地域觀念，它也可以增加學生對自己及地方特性的了解，配合對國家與全球的認識來了解趨勢、知己知彼，找出自己的長處、改正自己的缺失、學習他人的優點、避免他人的缺點，而對社會有所貢獻，或至少是與他人從事良性的競爭。相對而言，全球化或全球視野也必須有個人及地方特色的配合，或者說要讓能動者清楚自己的定位，讓所有的國家與人民都能貢獻自己的長處，而不是拾人牙慧、隨波逐流或變得單調而無差異。

就現況而言，今日台灣的教育面臨著一方面被批評過度爲難學生，另一方面卻又被批評爲品質不佳的弔詭情境。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我國現有的教育制度呈現國中小課程內容太難，學生競爭過早且過多，合作不足，教師沒有時間與能力將學生不足之處補救起來；高中缺乏不同程度的教材供不同程度的學生選讀，大學沒有依自己的需求選才，並進行嚴格的把關；過於急切

地將學生進行分類的作法，導致學生的惡性競爭，與社會階級的複製；過於鬆散的大學選才與淘汰標準，則浪費了國家資源，也沒有發揮教育的作用等等的問題有待解決（曾孝明，2004：119-136）。

七、高度現代性中充滿了各種風險、不確定性與新的可能性，也將出現各種不同的需求，宜以多元教育加以因應，多元教育除應重視不同的內容與形式之外，鼓勵積極面對差異與不確定性也有其必要性。

就如 King 所說的，「一切教育制度的前景就是為不確定性做準備，……對任何公共政策問題的研究，首先是對教育問題的研究，……因為教育就其本質來說，就是為了塑造未來或為未來做準備。」（王承緒、邵珊、李克興、徐順松譯，2000: 4）但如何為未來進行準備，不同的教育思想會有不同的策略，並建制不同的結構。雖然不同教育結構都有其各自的風險存在，但可以確定的是一致的教育制度所具有「單方向」發展的風險是極為明顯的，它既不能符合所有的人的需要，也無法因應快速的變化與取得最平衡的發展。因此，為因應不同需求而產生的各式各樣教育制度及結構將是一種勢不可擋的趨勢，也是因應變化的最佳方式，也將是最佳與最有效的教育制度。

因此基於不同個體有不同的需求，政府宜鼓勵多元化的教育方式，除了反教育、非教育的措施之外，基本上都應站在鼓勵的立場。除了在學校中進行多元文化的教育之外，也應該鼓勵各種非主流的教育方式，如各式的實驗學校、另類學校、在家教育、資源班、實驗課程等等。相對地，在學生方面，為培養學生面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能力，則宜積極鼓勵學生面對差異、欣賞差異，並從差異與不確定性中獲得成長。此外，知識也不應該淪為由只考慮能不能賣錢的商品化、市場化機制來決定取捨，造成一些有價值但卻無法「賣錢」的冷門知識被忽略、遺棄。